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现代性中国

主编 张颐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陈晓明 后现代主义

汪民安 身体的文化政治学

金元浦 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

陈定家 全球化与身份危机

陶东风 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

王岳川 媒介哲学

陈燕谷 新左派

朱学勤 新自由主义

郑家栋 新传统主义

张颐武 现代性中国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袁喜生

责任校对 史静

责任印制 王慧

装帧设计 张胜

新思潮文档

总主编 金惠敏

现代性中国

主编 张颐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中国/张颐武主编.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3

(新思潮文档/金惠敏主编)

ISBN 7 81091-336-0

I. 现… II. 张… III. 现代主义-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4895 号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袁喜生

责任校对: 史 静

责任印制: 王 慧

装帧设计: 张 胜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 475001

电话: 0378-2864669(事业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E-mail: 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13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 81091-336-0/B·114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金惠敏

总序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曾经自信地划出了一个相对于“文革”的“新时期”，那确乎是群情激扬、光辉灿烂的峥嵘岁月。不过今天从思想史或者思想创新的角度看，“新时期”之“新”似乎仅具有拨乱“返”正的意义，是严格字面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它远承“五四”精神，近接50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关注的主题如人道主义、人性论、主体性、异化、马克思手稿、美的本质、现实主义等等，均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时而低抑、时而高亢的老话题。而且，“左”、“右”对垒，阵线分明。“右”者坚信只要冲破“左”的禁锢，前景就是一片光明；而“左”者则认定，“右”将毫无疑问地导致动乱、无序和资本主义复辟。那时的“思想解放”其实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解放，要么就仍然禁锢着。这种水火不容的思想对抗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就是单纯而幼稚、激情而盲目，远称不上理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

进入90年代，思想界急剧分化，乱云飞渡，思潮翻涌。当我们感觉“新时期”这个概念已经无法表述我们当前的思想状况时，思想的“新时期”才真正到来。思维创新的佳境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它总是晦暗不明，难分难解，相互渗透，多种可能性并存。具体说，90年代的思想界不再是明朗的“左”与“右”，它呈现出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原生态，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共戴天的学说如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也不再能够划出个左右来,更兼以无从捉对厮杀的新儒家、全球化、知识分子、文化研究、身体注视、媒介哲学,等等。一个问题甚至可能是以其其他所有的问题为其语境。

但是如果将思想还原为现实,那么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化运动及其当前的全球化与古老中国相遇的产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其思想界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让传统发扬光大,如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就是让传统自己说话,而在中国则除了这层任务之外,更加之以如何与西方这个“他者”相对话。“传统”与“他者”可能就是当今最大的哲学问题。

将这些9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本归档整理,决不意味着它们已经成熟或者完成使命。应该承认,这些思想还嫌稚嫩,更谈不上形成什么定论。但是,它们是我们走过或达到的一个个里程碑,是当今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实录,更蕴涵着无限的发展契机。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前进的话,那么这些文本作为历史资料的参照意义甚或其作为思想地图的指示作用将都是不言而喻的。

知我者,罪我者,我们一概未示感谢。

惶惶然,谨此为序。

2003年8月29日

北京花园村

张 颐 武

导 言

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有关“现代性”引发的探讨和分歧。如果梳理90年代中国思想，“现代性”毫无疑问是其中的核心，由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立场和看法，真正挑起了中国思想的转型和演变，形成了90年代思想和80年代思想的区别，也形成了90年代独特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状况。

我们可以把这种“共识”称之为“新时期共识”。这一共识起源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新的国家结构，也出现了与这个新国家结构密切相关的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期望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则希望向西方敞开大门，走向世界，进行“开放”。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共同的反“左”，对于“五四”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反思之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们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的局限为中心，在“知识”领域中完成了新国家结构的意识形态工程。他们建构了两个方向的“共识”，而这种“新时期共识”也一度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首先，经历了“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挫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引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经验，以达到经济成长和发展有一致的“共识”。这可以称为“发展共识”。多数知识分子认为，经济发展乃是社会进步的中心标志。李泽厚就提出：“现代化又确乎是西方先开始的，现

代大工业生产,蒸汽机、电器、化工、计算机……以及生产它们的各种科技工艺、经营管理制度等等,不都是西方来的吗?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①作为现代化的西方化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这一“发展共识”的中心。第二,这里形成了一个“个人共识”。这个“共识”乃是基于对于“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以救亡为中心的“现代性”话语导致了“文革”的悲剧。而在“新时期”,个人主体的发展,个人解放应该成为文化的中心。李泽厚对此有非常简略的描述:“‘五四’运动是两个运动而不是一个运动。这两方面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启蒙是反封建,救亡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的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相平行的局面,政治救亡的主题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所以,‘五四’的启蒙工作基本上没有做。建国后也忽视了启蒙方面的问题,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紧接着就号称进入了社会主义,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没有受到过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击,封建主义仍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和无意识的深层。”“我认为,反封建仍然是现在的主题。”^②这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往往被阐释为封建主义对于个人的压抑。而再度启蒙则意味着对于个人主体的热切肯定,而对于“民族国家”的价值则相当忽视,也就是在启蒙/救亡的二元对立中强调启蒙的关键性。

“新时期共识”就是以“发展共识”和“个人共识”构成的一套话语,它所坚持的是现代性的普遍性,是以在欧美发展的现代性作为它的标准模式。这种对于“普遍性”的追求成为这一共识的关键。它成为“新时期”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相对一致的前提,他们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合法性的基

^① 《漫说“西体中用”》,《李泽厚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353页。对于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拙作《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9页。

^② 《走自己的路》,(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0年8月初版第288页。

础,而新的国家结构则为他们提供了舞台,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中心。正像李泽厚所表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同古代的士大夫一样,确实起到了引领时代步伐的先锋者的作用。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一点就更加突出。中外古今在他们的心灵上思想上的错综交织融会冲突,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逻辑,至今仍然如此。”^①“新时期共识”的存在保证了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的位置,也提供了一种一致的“现代性”想像的策略。当时对于“左”的批判并不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争议,而是与新国家结构共生的,知识分子共同一致的对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虽然知识分子内部也有许多分歧,但它们都不足以动摇这个“新时期共识”。而当时中国的经济通过对于原有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几乎所有人不同程度上受益,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和阶层的生活水平和利益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社会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及全球化的期望几乎是一致的,这也为这一“共识”提供了合法性。而“新时期共识”也成为海外和中国学术界“阐释中国”的知识基础。这一“共识”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一套知识框架和文化制度的投射。这种“现代性”的话语既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合法性的延伸,又是“新时期”中国思想情势的必然结果。因此,“新时期”的“现代性”正是以这样的形态展开的。它通过两个方向显示自身。它一方面将计划经济时代的“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封建”传统,通过这样的诠释将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和经济问题转变为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将“新时期”确立为“五四”的直接继承者,而跨过了现代历史的其他时期。

进入 90 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共识”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的新的世界格局和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 90 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 90 年代完

^①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第 344 页。

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是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社会避免急剧变化过程中的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的雪崩式瓦解和10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以及国际竞争的激化,民众的国家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中国的日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国家直接控制的工业资源已经不到30%,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主导下的所谓“公共空间”也已经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这种全面控制的基础早已瓦解,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民社会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及互联网的发展和国际投资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整个过程的关键性的环节,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在90年代初叶已经开始有了自己更为清晰的图景。中国的大量的劳动力和整个社会开始加入全球化的进程,这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

目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之中无疑早已不再是一个国家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关系和国家的政治象征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与此同时,阶层和地域的利益差距已经加大,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域的所得往往和另外一些人和地域的所失相联系。这使得我们难以承受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矛盾,不同的利益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全球化也冲击了社会,将一些人抛到了历史之外,生活直接面临困难。贫富分化、腐败、地域分化、环境问题等等都深刻地损害了社群的活力,也使得公共生活面临威胁。但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显。中国生活的几乎所有环节开始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在90年代的“后新时期”开始超出了中国“现代性”所规定的历史范畴。

实际上,90年代的“后新时期”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新时期共识”面临着挑战,从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到有关“后现代”、“后

殖民”的讨论都涉及了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① 它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知识分子一方面已经开始“边缘化”,不再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而开始出现了大众文化主导的新的结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也开始出现一系列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正在扩展。对于“新时期共识”的反思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新时期共识”必须回应和说明 90 年代以来中国为何在“个人共识”没有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当然这里的实际情况也非常复杂,在基层民主、民间文化空间的营造方面也有相当进展),经济和社会生活取得了巨大发展的问题。“个人共识”也无法回答“冷战后”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的利益争夺和本土化的趋向仍然异常活跃和强势的问题。西方式的普遍性显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其次,“新时期共识”面对着“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下岗、腐败、跨国竞争的不平等,等等,这使得发展带来的财富公平分享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有关“发展共识”中,经济发展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表述受到冲击。“普遍性”在这里也成为问题。于是,如何对子中国当下的现状进行“阐释中国”的工作,如何寻找一个不同的知识框架,乃是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对于“中国”阐释的巨大焦虑,是无法回避的。90 年代的中国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二

徐静蕾的电影《我和爸爸》在 2003 年的冬天上映。这部电影让人惊异地发现当年曾经叱咤风云的王朔式的“顽主”今天已经衰老,已经成了今天文化的多余之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期和 90 年代,王朔小说中的那种典型的人物——“顽主”曾经激发过广泛的关切。他们在当时社会转型中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游离了出来,最早感受到自由的风气,对于传统的秩序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叛逆性,他们并不按照当时的价值行事,而是在边缘处以一种强调自我、快乐和嘲讽的调子展示自己的存在。王朔的小说其实是表现

^① 有关这两次讨论的情况可参见拙作《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41—164 页。

这一类人物的最为有力的文本。对于这类人物来说,在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发展的“前期”,他们一面是传统的秩序否定的对象,另一面却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看似在社会边缘,其实却异常引人注目,是社会的焦点。按照王蒙的一篇著名文章中的描述,他们乃是“躲避崇高”的。他们冲击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凸现新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先驱者的形象通过“顽主”的表现凸现了出来。它显示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前期”社会对于自由的理解。他们是在旧的结构开始解体,而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还未建立时的社会状态的表征。这就是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的特殊的表征。

经过了大约十多年的时间,我们看到徐静蕾的电影《我和爸爸》时,突然发现当年叱咤风云的“顽主”已经变成了今天的“爸爸”。虽然还有当年叛逆者的影子,却已经垂垂老矣,变成了渴望温情的角色,他们的孩子竟也长大成人。虽然仍然另类,却似乎已经从时代的焦点上退了下来。这里当然展示了一个另类的父亲和女儿的相濡以沫的情感,却让我们看到了“顽主”的衰老和没落。父亲的“顽主”生活是在少女小鱼的眼中出现的,所以难免产生冲突,但父女间的感情却也通过这位父亲独特的沟通方式和泰然自若的表达慢慢建立起来,直到父女互相理解。但无论如何,当年曾经如此感染过年轻人的“顽主”生活却已经变成了女儿小鱼眼中的怪异。这种怪异当年曾经由于冲击了传统的价值和秩序而受到赞美,如今在电影中却难免变得难以理解。过去的“顽主”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于少女小鱼的吸引力仍在,但它却难以支撑当下的日常生活。爸爸和朋友的放纵自在的生活被小鱼质疑的同时,却也面临着自我的挑战。中国在新世纪成为跨国资本投入的新中心,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开始作为世界强者之一的参与世界事务的要求也已经取得了进展。中国的“中等收入者”的定位是进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一波发展,于是并不要求“顽主”式的叛逆和嘲讽,反而需要循规蹈矩的“白领”。这里的“老顽主”一面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一面却发现自己的那个黄金时代正在迅速逝去。新的秩序今天已经越来越明确化,已经建构了自己的一整套“成功”的话语。“顽主”们所提供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显示了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前期”的20世纪90年代是

一种前卫和时髦,但和“新世纪文化”还有巨大的差异。其实,近年来王朔的沉寂和像梁左这样的人物的故去都喻示了我们曾经置身其中的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新时期”已经逝去。只有像冯小刚这样异常灵活和敏锐地抓住新一波全球化进程的人物仍然处于文化的中心。但他的“贺岁片”也已经从过去的表现“顽主”式人物的《甲方乙方》和《不见不散》转向了表现新的世纪里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的家庭危机的《手机》。“顽主”的消失明明白白地喻示了“后新时期”的 90 年代已经转向了一个“新世纪文化”的时代。

其实,这个已经逝去的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后新时期”对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来说具有高度重要的意义,对于 90 年代“后新时期”文化站在新的世纪的反思应该开始。从今天的角度观察 90 年代的“后新时期”的文学和文化史,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其历史的关键的价值。从 90 年代直到今天,对于 90 年代文学和文化的评价一直是较低的。许多人认为 90 年代的“后新时期”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冲击了高雅的文学。文学的衰落和高雅文化的衰落导致了文化的危机。人们普遍认为 90 年代的文学的“高端”部分在市场化 and 全球化的冲击之下产生了危机,就是始终对于 90 年代有较为积极评价的人也难免在这些问题上充满困惑。90 年代的“后新时期”在知识分子内部出现的原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出现的有关“人文精神”和“后现代”、“后殖民”等等问题的激烈的讨论其实是对于 90 年代的“后新时期”出现的两个文化要素的困惑和焦虑的结果。这两个文化要素,一个是消费主义的发展带来的日常生活价值的改变,另一个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带来的高雅文化的危机。

这两者都对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信仰的“现代性”的话语和文化制度造成了威胁。于是,对于 90 年代文化的激烈的抨击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难以回避的激情选择。“人文精神的失落”的呼喊其实正是这一激情选择的标志。当时其实进行了一场高雅的“文学”对似乎“低俗”的“文化”的冲突或战争。“文学”一反它在整个“五四”以来“新文化”中的中心地位和支配性角色,不再能够指导整个文化,而是似乎要从整个文化中分离出来,成为它的对立面。于是,所谓“抵抗投降”的话语无疑是文化冲突的表征。在这里,王朔成了“文学”与“文化”的冲突的焦点。王朔曾经是一个文学人物,在 80 年代后期的创作已经引发关注。90

年代以后,他对于“现代性”话语的蔑视和以大众文化的“英雄”角色出现,更使得他的“顽主”形象遭到了异常严厉的抨击。“文学”在向大众文化宣战的同时,它自己的内部也迅速地分裂。一面是一批和市场与消费文化相关联的作家的崛起,另一面是“文学”内部对消费和大众文化彻底“否定”的派别和表明“理解”的派别(当时在“文学”内部并没有支持和肯定大众文化的潮流,而“理解”是当时论战的一种声音)的争议愈演愈烈。对于王蒙的《躲避崇高》的批评就是“文学”内部分裂的标志。作为80年代的“新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文学”的主要的发言人的王蒙当时受到的批评显示了“文学”内部分裂的程度。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市场化带来了人的堕落和民族的堕落。“否定”派认为这种堕落已经发展得异常严重,而另一派则对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有更多的理解。一部分知识分子强调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消费”时代给中国带来了异常巨大的危机。他们要进行一场“抵抗投降”的崇高的圣战以捍卫“现代性”话语的神圣性。他们决心对抗性地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后果,认为这种消费的浪潮和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会导致危险。他们试图在中国语境中彰显自身的对抗性的形象。他们对于消费文化和中国的日常生活的改变抱有极度悲观的态度,认为经济的发展和负面效果会导致人的“堕落”。这并不是“五四”“现代性”的思路,而是一种在捍卫“现代性”的旗帜下的一种背离和偏移。他们对于“个人”的激情肯定其实也导向了一种对于“个人”的理解的偏执。“理解”派则试图理解新的时代。在对于批评理论和中国文化现实的阐释中对于“消费”和中国的爆发性的经济增长做了相对平和的分析。在理解消费和中国人改善生活的愿望的同时也试图进一步阐释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和大众文化的崛起。这种思路也力图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局限,在对于“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阐发中找到新的文化图景的描述。

但从今天的“新世纪文化”的立场观察90年代的“后新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想象的民族的堕落和“人文精神”的失落的恐怖的景观并未出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90年代,和消费与大众文化一同崛起的还有中国本身。经过了90年代的经济的高速增长,21世纪的“新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历史的景观。这些变化都体现在文化的转变之中。这种转变可以用《新周刊》2003

年10月1日那一期的表述来形容。这一期《新周刊》的主题是“新新中国”。编辑有这样一个表述让我有所触动：“对于‘中国’来说，‘新中国’这个词语一直表明着政治上的新，政体的更新；如今在生活方式、文化时尚形态上有着全新的方向与发展可能，‘新新中国’冒升而出。”这个“新新中国”的描述的确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历史发生的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全球层面上都前所未有的。90年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到新世纪已经由朦胧而日渐清晰。中国作为全球生产和资本投入的中心的崛起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日益形成几乎是同步的过程。中国开始告别现代以来的“弱者”形象，逐渐成为强者的一员。新的秩序目前并没有使中国面临灾难和痛苦，而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机遇。这里中国内部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但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中国的两个进程已经完全进入了实现的阶段：首先，中国的告别贫困，高速的“脱贫困化”正是今天中国的全球形象的焦点；其次，中国开始在全球发挥的历史作用已经能够和全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划开界限，中国的“脱第三世界化”也日见明显。这两个进程正在改变整个世界。而这种改变强烈地需要新的文化想象。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消费与大众文化一起在中国崛起的还有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当中国的人民大胆地追求消费的满足和大众文化提供的新的想象和生活方式的表征之后，他们争取更好的生活的世俗的梦想居然为中国人一百年的民族梦想的实现准备了条件。“五四”先驱者通过“现代性”提出的“强国”的梦想，并没有在“现代性”作为文化的中心的时代中实现，竟然是以一种“后新时期”的和“现代性”的话语相分离的形态实现的，“五四”“现代性”提供的宏伟的、乌托邦的“中国梦”却是在90年代以来的具体而世俗的“中国梦想”的追求中实现的。“五四”的先驱者并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自己民族的承诺乃是最关键的承诺。所以，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的肯定当然应该是中国的“现代性”的理想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实现却是在一种消费和大众文化的独特语境中实现的。这似乎是一个先驱者的目标和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之间分离的结果。

从今天看来，当年的无论是“否定”派还是“理解”派其实都没有能够深入地了解消费和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的价值和

意义。90年代“后新时期”不仅仅是市场和消费追求爆发的时期，而且是中国的“和平崛起”的最关键的“前期”，其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消费和大众文化在人们都可以认知的消极面之外，起码有一些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了解。这种意义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具有强烈的个体性的意识，它将个人改变命运的努力首先视为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结构的限定，个人有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能力，也有自我争取的可能。这就与“五四”以来将个人的命运放置于社会结构中的限定性的选择完全不同，显示了脱离“现代性”话语的强烈的逆反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提出了对于个人自我发展的可能。这和新时期文化中的“个性解放思潮”也有极大的差异。新时期的个性解放是强烈要求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后新时期”的大众文化则只是为个人的选择提供想像。这恰恰将个人从结构中超离出来，将他们转化为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中的劳动力，成功地参与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到消费的整个链条，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准备了历史的具体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五四”时代现代性提供的梦想，只是这里的方式是“五四”先驱者们不可想象的。

其次，“后新时期”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对于未来的想像。这种想像一方面延续了现代性对于物质生活的承诺，另一方面，却扬弃了现代性有关“理想社会”的宏伟构想。将社会目标降低到日常生活满足的具体而微的选择中，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趋于世俗化和平凡化，这当然放弃了现代性理想的乌托邦色彩，提出了不同的选择。在世俗生活中发现一种具体而微的对于未来的承诺和期待。这种理想的变化的前提是对“五四”共识的超越。但这却最终构成了对于“五四”理想的“中国”崛起的期望的实现。

第三，“后新时期”大众文化以娱乐和消闲为美学的原则。这直接承继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将现代性感时忧国的传统加以搁置，大众文化充分展示了消费文化的合法性。消费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却使得个人在追求日常生活满足的同时改变了历史和全球结构。

从这三个方面看，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和消费的合法性已经体现了出来，它们也参与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它们当然

还存在严重的问题和缺陷,对于这些问题和缺陷的批判和否定仍然是具有很高价值的,但它的积极意义也是难以否定的。

而与此同时,“现代性”的问题和90年代以来一直面对的挑战其实是如何与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们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危机。它在分析和反思历史,在追求高雅理想过程中的成就不应该否定,但面临的困难也不能不正视。“现代性”在90年代以来的困难,在今天可能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当“现代性”无法面对时代,无法给予时代以新的理解和思考,大众文化对于它的替代,并在中国的想象中处于越来越关键的位置也是必然的。这不是说大众文化不应该批判和反思,而是说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应该更加深入地以新的视角来进行。我们的文学必须超越“五四”先驱者规定的“现代性”的话语,必须要在新的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语境中提供新的想象,必须和新时代对话和沟通。没有这种新的改变,文学不会有活力;没有面对新世纪的勇气,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继承“五四”先驱者的创造精神。想想当年先驱者对于传统文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勇气和面对新时代的灵活性,我们就会知道,对于他们的盲目的崇拜和片面的理解,其实是对于他们的基本精神的最大的背离。让我们有勇气和智慧和自己的时代一起超越先驱者的辉煌,创造自己的新空间。

当然,大众文化的崛起仅仅是90年代文化告别“现代性”的一个方面。但从这个方向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运行的轨迹。

三

这部文选就是力图反映90年代的“后新时期”的文化对于“现代性”反思的成果。这里一面是对于当时历史“氛围”的投射,一面是对于当时的知识状况的投射。我的编选就是从这两个方向试图对于当时的历史氛围有所探索。我们并不试图给历史一个全面的描述,面只是试图将历史的不少散点投射在这本书中。通过这本书,我们将再度和已经逝去的90年代对话。应该说,我们的思考刚刚开始。